

在技术与理性之间：互联网时代对李普曼、 杜威之争的再度审视

王颖吉

摘要：新技术的变革总是让人们对未来生活产生无限的遐想，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赋权现象也无形中催生了某种技术乌托邦理想，似乎技术可以解决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难题，人类在政治理性上的缺陷并不会阻碍理想的实现。20 世纪 20 年代李普曼和杜威之间进行的一场影响深远的论争，体现了在技术和理性之间的张力。李普曼强调了政治理性传统的重要性，主张精英治国的理想；而杜威则坚持大众民主，并且将未来技术条件的改善作为理想政治生活得以实现的保障。当我们站在 21 世纪的历史节点上回望李杜之争时，对于自身所处时代的技术政治理想便能够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认识，这种认识也是我们认识自身责任的开始。

关键词：技术赋权；政治理性；李普曼；杜威；互联网政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5)05-0133-07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5.05.016

互联网及手机等新媒介对于社会现实具有重构性影响，围绕着新的技术平台而展开社会政治活动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无论是在政治组织形式、意识形态调整、社会动员方式、信息监控模式，还是民主参与渠道、政治互动方式等方面都体现出不同于传统政治生活的特点。新技术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往往容易使人产生错觉，触网人群开始想象以互联网为平台重建政治生活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要内容屡屡被描述为无权者通过新媒介赋权而重返政治生活的中心，公众可以借助新技术实现对各项政治活动的参与和决策，一种真正的草根民主将逐渐取代精英化的代理民主而成为未来政治模式。“有人宣称，互联网结束了信息垄断，瓦解了独裁者的统治。……互联网将以其他的方式振兴民主；公众有了前所未有的存取信息的能力，他们将能控制政府；互联网还能瓦解精英的政治控制。正如马克·波斯特所言，互联网‘赋予受排斥的群体权力’。……在这个勇敢的新世界里，草根阶层将开垦权力，启动‘民主复兴’的时代”^{[1][P13]}。

尽管这样的故事所描述的场景并不全是虚幻的，技术确实在向着预言的某些方向发展，但在这些弥漫着激动和乐观情绪的故事中，也展现出其简单化的一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带有技术乌托邦色彩的假想，即新技术是实现政治理想的金钥匙，有了这把金钥匙，公众便能够拥有更加美好的政治生活前景。然而，这些有关技术变革与未来乌托邦的故事中，却往往忽视了政治哲学中的诸多难题，这些难题涉及技术管制、内容审查、多数暴虐、认知缺陷等外部及内部影响因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由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提出的：公众认知环境的复杂性和理性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之间所存在的深刻矛盾。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赋权现象，容易导致人们只看到它在改善政治生态方面有力而积极的一面，却对它产生的负面影响视而不见。很多时候，人们容易陷入传统政治理论的假设，公众具有天赋的政治理性，在外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完全能够正确运用理性对公共事物加以认知和判断，因此，公众所缺乏的仅仅就是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和条件。然而当我们细细思考时，又不禁会问：这种

作者简介：王颖吉，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5）

普遍存在的天赋理性究竟如何可能?或许需要更进一步加以追问的问题是,技术与公众政治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技术在赋权的同时,是否也促进了公众的理性的形成?显然,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看,只有当技术赋权与政治理性两者兼得的时候,我们才能避免将强大武器交付给暴民或疯子掌管的那种危险。

一、无知公民与全能公民:政治哲学的两种传统

由于公民的政治参与同时涉及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因此政治学家们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往往都会同时涉及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但对于究竟哪一种因素具有更为根本的影响,不同学者会有不同的倾向性,由此而形成了强调外部条件和强调内部理性的两种传统。前者倾向于认为影响公民参与的外部条件,如参与的媒介渠道、信息权力、表达权力、传播技巧等,对于公共政治和民主所产生的作用,要比公民的心理和认知能力因素更为根本;与此相反的倾向则被视为强调内部因素的传统。

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设计,体现了对公共政治的外部因素的优先考虑,雅典公民往往对于自己的制度设计感到自豪,因为这种设计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公民的政治参与。但这种民主设计及其实践却遭到柏拉图深深的质疑和批判,并由此而形成了强调政治理性的传统。在柏拉图心目中,苏格拉底无疑是全希腊最值得尊敬、最正直、最有智慧的人,但正是这样一位智者,却被雅典的民主制法庭以“腐蚀青年人的心灵、相信他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国家认可的诸神”^{[2][P10]}的罪名判处死刑。在柏拉图看来,雅典的民主产生了将智慧边缘化的效应,它导致政治理性、道德素质、专门技能让位于情绪化、浅薄化和主观臆测,最终制造了不可逆转的悲剧。由此,柏拉图以近乎极端的方式强调理性和智慧在政治中的作用。《理想国》一书中的政治框架,体现了他对于政治智慧和理性的强调。国家的权力必须掌握在经过哲学训练的贤人手中,由他们形成统治层,以保证国家各项政策的合理性。亚里士多德虽然不像柏拉图那样排斥民众的直接参与,但他承认政治生活中确实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理性困局。这种困局是由人的认知能力缺陷造成的,普通的公众并非没有智慧和理性,但其程度极为有限,如果公共事务过于复杂,那么公众的认知能力局限就会显露出来。为了解决这种困局,亚里士多德建议城邦和国家的规模不宜过大,应该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以内,以便能够与公众的认知能力相适应。

古典政治学中有关人的政治理性能力存在缺陷的论断,被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抛弃了。为了强调天赋人权,启蒙思想家们倾向于认为,人们在认知和理性方面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在约翰·弥尔顿、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斯图亚特·密尔等人看来,真正阻碍民主政治的因素来自外部条件而非内部局限,如果人们能够争取到言论出版和信息传播的自由权力,那么在充分了解事实,并能够自由交流协商的情况下,公众的意见能够形成至高无上的公众舆论,这种由全体公众意见达成一致而形成的公共舆论被卢梭称为“公意”,在公意的引领下,民主政治的理想就能得以自动实现。这种观点几乎支配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西欧政治哲学,在其影响下,对于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力的争取成了这一时期政治生活的主要议题。

到十九世纪后半期,民主政体在西方世界逐渐确立了其牢固的地位,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的权力已经得到了法律层面的确认及保护,但政治民主的理想却并没有得到相应实现,一方面权力和商业力量对于言论出版及新闻自由的干预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工业化使得社会的规模不断扩大,人们进入了“大社会”时代,所面临的环境也日趋复杂。在无法通过直接经验了解事情真相的情况下,新闻报刊业兴盛起来,充当了公众的耳目喉舌。然而,无论是言论出版自由权力的确立,还是报刊新闻业的兴盛,信息与传播条件的改善似乎都没有能够使民主的理想得到完美的实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知识层对“乌合之众”的群体心理现象感到担忧,而欧洲国家在内政外交上不断出现的决策失误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延展。对于以草根民主立国的美国来说,这些政策与公共舆论的政治倾向密切相关,这种情况引起了知识精英对于传统民主理论的深刻怀疑。

二、技术或理性：李普曼与杜威的救赎之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古代希腊思想家有关公众政治理性缺陷的议题被重新激活了。李普曼在1922年以振聋发聩的观点提醒人们：对于民主国家来说，政治的关键是公共舆论问题，而公共舆论问题的实质是大脑图像与外部现实之间的符合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讲，舆论乃是人们头脑中的图像，即“他人（人们）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这些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公共事务或活动）的个人产生着影响的图像，就是大写的舆论”^{[3] [P23]}。可见，舆论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如果不能从心理认知层面加以认识是很难对其持有深刻理解的。总体上来看，李普曼认为“大社会”中公众认知社会现象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这与人们进行认知活动的内外部条件有密切关系。

外部的限制性条件诸如信息审查与保密、交际网络与获取信息的机会、用于获取信息的时间与注意力以及信息本身的清晰度、新闻报道本身的特点和媒体的商业性质等等，但这些外部的限制还不是导致人们无法形成正确认识的全部原因，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人们的心理认知方面，比如人们的刻板印象（成见）心理就是影响认知的重要因素，那些日积月累的印象、偏见和成见有力地支配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既然人们在正确认知社会真相的道路上存在着这样多内外部限制性条件，并且，虽然限制人们认知能力的外部限制性条件可以通过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加以改善，但人们的心理认知能力上的缺陷几乎无法加以克服。因此，人们应该将认知社会真相的能力交付给由经过专门训练的专家组织而成的专家机构，由这些掌握了科学认知方法的专家们从事经常性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然后再将科学结论通过媒体告知于公众。李普曼希望通过破除传统政治学的“全能公民”观念，而代之以“全能专家”的观念。

然而，这一方案导致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如果公民因其认知和心理能力存在缺陷，将探究社会事务真相的全部努力托付于专业的科学家组织，他们将沦为社会事务的旁观者；同时，并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确保专家机构工作的纯洁性以及对公众利益的忠诚性。换句话说，如果专家们因为政治和商业的原因，蜕变为公众利益的对立面，公众及其利益将面临巨大的危险。

正是由于看到了这种危险，约翰·杜威撰文指出：李普曼的著作堪称是有史以来对民主制度所进行的最有力的控诉，尽管他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却没有提供正确的答案。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中，他继续思考与此相关的问题，并在1927年出版《公众及其问题》一书，对李普曼方案正式进行了回应。杜威明确提出：排除公众参与和承担政治事务的方案是非常无知、轻率、偏见、嫉妒和不可靠的，让人们被动地服从于知识分子的规则也是不合适的。杜威主张公民广泛参与政治讨论，并在社会基层的层面上开展社会探究活动，主张将社会探究和良好的传播条件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当自由的社会探究与丰富动人的沟通艺术不可分解地融为一体时，民主就达到了其自身理想状态”^{[4] [P191]}。由此，尽管他认为李普曼有关人类认知和心理能力存在局限性的论述是正确的，人们确实在认识真相，建构有关世界的真实图像方面存在极大的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专家和精英治理的方式能够解决问题。相反，“拯救民主弊病的良药就是变得更加民主。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困难在于探究一种方式，借由这种方式，一个分散的、流动的、多样的公众能认识自我进而表达自我的利益诉求”^{[4] [P150]}。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如何找到一些条件，让公众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共同目标，并且在对此一目标的理解基础上，实现协调行动和联结，使得工业革命造成的无机化的“大社会”变成有机的“大共同体”。这一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从根本意义上讲，民主就是共同体生活观念本身。“只有当我们以共同体作为一个事实为前提，并且在脑海中紧扣这一事实，以便能弄清楚和提升共同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我们才能到达一种非乌托邦的民主观。”^{[4] [P153]}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公共传播技术和手段的改善便显得极为重要。人群的交流 and 联结、社会事务的探究、公共舆论的合理性、

科学知识的扩散应用以及共同经验的形成与分享,都需要以传播的技术条件作为其基础,因此“收集信息的物质及外在手段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理性探究过程及其结果的结构”^{[5] (P23)}。显然,正如普莱斯所言,在杜威看来,“真正需要的是改进争论、讨论和劝导的方法与环境。这才是公众真正的问题所在”。在拉斯韦尔《公共舆论产生民主》(1941)这本书中,有一章的标题精辟地表达了与杜威相同的意思“民主需要新的表达方式”^{[5] (P21)}。这种见解使得杜威对技术和媒介条件寄语了积极的理解与期待,传播技术平台的改进似乎预示着一种新的可能性:在这一新的平台上,新闻的质量可以得到改善,社会探究知识的传播可以得到艺术化的传达,正确的公共舆论也可以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得以形成。

这种乐观的技术期待最终导致杜威表述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民主理想,“最高级与最困难的探究和一种微妙的、精致的、生动的与敏感的沟通艺术必须在一个传递与循环的物理机制中成为主导,并灌注生气于其中。一旦机器时代的物理机制臻于完美,这一机制将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暴虐的主人。民主自然而然就会到来,因为民主就是自由而富足的共享生活的代称”^{[4] (P191)}。需要在这里加以强调的是,杜威的技术乌托邦理想是建立在他对参与式民主得以实现的条件进行认真探究的基础之上的,杜威并不打算成为一个空想的乌托邦建构者,他曾经指出“理想不是梦想,理想主义也并非浪漫主义和营造幻想的同义词,必须十分现实地研究实际条件,……使其具备实际性,并使之成为可行目标。”^{[6] (P335)}然而,杜威所提出的条件极为严苛,这些条件几乎涵盖了从信息公开、充分参与、自由讨论、面对面交流到社会知识的艺术化传播、公民应具备基本判断能力和智慧等诸多方面。然而,正如罗伯特·威斯布鲁克所批评的,“杜威列举了形成伟大共同体‘无限困难’条件,但却未对如何克服困难给予任何现实指导,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论证几乎接近于断言幻影公众不会具体体现的李普曼”^{[6] (P335)}。事实上,杜威对于公众政治理性的强调一点也不比李普曼少,差异之处仅仅在于他并不像李普曼那样对公众理性失去信心,而是希望能够从绝望之中找到希望。由于这种希望在现实环境和土壤中根本找不到依据,因此杜威只能将赌注放在未来技术条件的改善上。显然,从杜威认真地探究实现参与式民主的严苛条件之后,依然略显草率地抛出技术乌托邦方案作为解决办法的做法,我们似乎看到了他“理想主义”的一面,尽管他力图避免成为空想主义者,但为了实现参与式民主的政治理想,杜威还是愿意对未来时空中发生的事情赌上一把。

三、技术效应与消逝的技术乌托邦

对于生活在二十一世纪早期的人们来说,由于站在历史的后视镜前,因此便得以享有回望先贤言论得失的优势。在时隔九十年之后,再来检视李普曼和杜威当年的争议以及他们各自的解决办法,其意义恰恰在于理解当代新媒介环境下的网络公众及其所面临的问题。

在数字化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网络公众在参与渠道方面已经有了大幅改善,人们不仅可以利用媒体技术突破权力设置的信息屏障,收集到政治参与所需要的知识和材料,并且网络公众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联结,从网络论坛到社交媒体,再到微信朋友圈,身处互联世界中的公众通过计算机和手机进行着人类有史以来最频繁、最复杂的互动。更重要的是,网络上的交流与互动形成的网络舆论,对于实际的政治和社会事务正在发生日益明显的影响。网络反腐、网络调查、网络救助等线上与线下的联动方式也确实在改变着现实社会的政治运行模式。就我们所看到的情况而言,网络时代本身所蕴含的政治参与模式无疑具有大众民主的特征。看上去似乎杜威的观点在数字媒体时代得到了回应,互联网不仅改善了信息获取渠道,而且网络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颇为积极,并不像李普曼在二十世纪初期所看到的那些“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7] (P4)}的公众。

然而,如果我们就此认为互联网可以保证健全而合理的公民政治参与得以实现,那就显得太过于天真了。杜威关于新技术能够导致“大共同体”实现的预言并没有得到实现,因为杜威所设定的那些建设“大共同体”必须满足的条件并未得到实现,李普曼所质疑的公众政治理性也并没有得到改

善，技术的巨大飞跃对于人性的弱点似乎并不能起到什么积极的改善作用。在杜威的预测中，最让人感到遗憾的莫过于他对未来技术的后果缺乏忧患意识，尽管他对于自己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技术弊端有深刻的洞察和批判，但当他谈及未来技术社会时，这些洞察与批判思维便不再起作用，似乎弊端仅仅属于过去和现在，而不属于未来的技术社会。然而，正如尼尔·波斯曼所说“认为技术革新只会产生片面效应的观点是错误的观点。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8] [P2]} 技术并不仅仅是工具，它对于人及其生活的重新建构是整体性的，也即“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8] [P9]} 技术改变的不仅是人们交流与联结的方式，也不仅仅只是改变人们的整体生活模式，而且还会改变人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如今，身处新媒介政治生活中的网络公众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并不是信息缺失、信息鸿沟、信息监管等，这些问题终究会随着媒介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而得到不同程度的消解，然而由新媒体自身的媒介性质所造成的新文化，正在增加人类非理性行为和思维方式的风险，正是这些与新媒体的使用相伴生的非理性思维风险，使得互联网政治和舆论的未来变得更为复杂而非更为乐观。具体而言，这些风险至少可以包括以下方面：

（一）信息内爆与碎片化思维

互联网具有海量的信息并且更新速度前所未有的，但它所引发的文化效应与印刷时代的书籍大不相同，尤其在理解信息的深度和保持思维的一致性、连贯性方面，两者差距较大。互联网信息生产与流通的特征是碎片化、浅薄化、平面化、快速化，这种阅读习惯的养成反过来也影响了人们的思维习惯，使人们在思维上也体现出碎片化、肤浅化、心不在焉和非理性的特征。

互联网信息数量庞大，且这些信息并不具有严密的组织性，而是像一大堆随意放置而杂乱无章的东西，同一媒体上的不同信息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内在联系。这种碎片化的信息传播模式早在传统的新闻业中就已经初露端倪了，报纸和书籍的最大区别在于书籍的信息传播模式是线性化、组织化和系统性的，这种组织性和系统性首先来自于作者的哲学价值观或者思想框架，在这一思维框架的基础上作者围绕一个具体问题展开论述，书籍的各个章节安排必须是纲举目张，环环相扣的。其次在行文上需要具有逻辑性，语言风格也体现出较为稳定的个性化风格。严整而统一的思维逻辑是文字媒介在内容上的必然要求，不符合这些要求的书籍是不能出版的。相应的，学校教育的首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整理思维的能力，只有具备这种能力，一个人才能进行有效交流。

如今，随便打开一个门户网站的主页，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各种信息扑面而来。这里不仅有新闻，还有各种闪烁弹出的醒目广告，以及各种以色情暗示为主要诉求点的娱乐信息。如此众多的信息相互之间毫无联系，编辑能够做的事情是将它们按照新闻、娱乐、广告这样的大目录来给它们进行归类，或者将新闻按照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教育这样的类别加以归类，不过这种归类的工作并不能解决人们在阅读和接受网络信息时感受到的杂乱无章和碎片化。与碎片化密切联系的是网络信息的肤浅化，由于网络信息存在追求新、快、多的特点，因此无论是信息的制作传播还是信息的接受理解都是浅尝辄止、不予深究，互联网的传播模式是浅层的，其受众使用新媒体的思维模式也倾向于浅层模式。

（二）用户粘度与娱乐化

对于互联网媒体来说，思想的浅薄可能还不是最可怕的，而是迫于媒介竞争的压力而进行的媚俗化信息生产倾向，媚俗化不仅使我们的信息环境严重恶化，而且还直接导致我们在信息消费方面的品味和习惯发生变化，感官刺激性的信息生产与消费活动逐渐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常态，以至于网络公众正在一点点地丧失鉴别新媒介所传播信息品质的能力。

增强用户粘度几乎成为当代媒体获得成功的唯一秘诀，“粘度”指称的是用户对于媒体依赖的程度，如果用户一天24小时都被绑定在某一媒体的页面前，此媒体的用户粘度便达到了最理想的状态。粘度是媒体竞争的核心，没有用户粘度的媒体无疑会被淘汰出局。因此，当代商业化环境中的媒介都不遗余力地追求传播的效果，尽可能地吸引最大多数的受众，这已经是媒介运营的“绝对真理”。为

了争夺到尽可能多的受众,新媒介运用其科技和网络优势尽可能地提供异乎寻常的感官刺激来吸引受众。具体的手法包括:在内容上更多地选择社会新闻中具有庸俗化、碎片化、感性化倾向的题材,因为这些题材能够引起更多普通受众的兴趣。在表现和修辞手法上,客观、准确、简洁、精炼的纸媒报道标准,正在让位给煽情、夸张、冗余、琐碎的新媒介报道标准。网络新闻的标题时常追求耸人听闻、煽情猥琐的效果,其实际内容与其标题有较大的差距。人们所谓的“标题党”就是对这种题文不符、过于耸人听闻的标题制作方式的形象称谓。而在正文的写作上,也改变了过往客观、准确、精炼的风格;更多地采用文学修辞的手法,铺成渲染,致力于对受众的情绪调动,以便获得较强的用户粘度。

媒体对粘度与娱乐的追求不仅威胁着网络公众对信息品质的鉴赏判断能力,而且也使得他们难以集中精力和时间对真正有价值和严肃的社会政治事务进行关注与思考。

(三) 时间与速度

正是由于新媒介信息传播碎片化、肤浅化的特征导致了在传播过程中它的使用者都习惯于接受新的信息,难以对同一信息保持长时间的兴趣,更难以对这些信息进行深度理解。众所周知,在批评和讨论中如果没有充裕时间进行理性思考,互联网上的这些活动就只能诉诸非理性了。然而,既然人们要在网络中快速接受大量信息并且还要饱受信息碎片化和肤浅化的折磨,那么进行理性思考和认真的调查研究就是完全不现实的事情;即便愿意花费时间去思考、调查和核实,等你思考清楚并调查核实之后再发表议论引导舆论时,你会发现自己所做的这些努力全都失去了意义,因为此刻普通网民已经不再关注这一事件,他们的全部热情和全部冲动都早已转移到当下发生的事情上去了。网络上的信息流通与消费时间的稀缺是造成互联网思维非理性特征的一个重要原因,适应互联网要求而出现的大量“快思手”,其实并不意味着快速地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思考,而是不断重复自己早已习惯了的思维方式,平庸地运用模式化思维看待一切,以牺牲思维的深度为代价,换取互联网在思维速度上的要求。

(四) 情绪化反应

由于存在以上所述的思维碎片化、娱乐化和肤浅化倾向,最终导致网络公众的参与行为往往呈现出情绪化特征。这种情绪化的最直接表现就是网络空间总是充斥着流言蜚语、谩骂攻击、偏激仇恨。事实上,非理性的情绪化反应并不是作为政治行为主体的公众所具有特点,而是“乌合之众”所具有的特点。

“乌合之众”在勒庞那里指的是容易受到暗示和情绪传染而在行为上采取偏激、冲动、攻击等失范行动的社会人群聚合状态,它对于社会所产生的破坏力极为严重。在“乌合之众”中,人们依靠情绪的暗示、模仿来行动,理性被非理性所取代。网络公众发出的声音中,最常见的情绪化表达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和地域攻击方面,而官民、贫富、医患、性别、民族与宗教方面的攻击情况也不鲜见。网络仇恨、攻击、造谣等现象带有一定普遍性,这在涉及公众事务的新闻跟帖评论中可以看得出来。一方面,人们因为技术条件的改善而获得了参与公共政治和媒体新闻评论的渠道,网络公众得以表达意见和以诉求的方式对公共事务进行参与。网络跟帖的数量较多,说明公众参与的情况不同于纸媒时代;另一方面,从评论的质量上看,网民意见以感性意见为主,缺乏深思熟虑和理性探讨精神,一般都是三言两语宣泄完了事,理性争论的情况相对较少。网民的这种情绪化反应固然与公民素质教育滞后有关,更是互联网媒介本身固有的传播特性所造成的结果。

毫无疑问,由互联网自身的媒介特性所导致的非理性表征远不止这些,囿于篇幅所限就不一一展现了。不过从以上所述的这些内容可以看出,互联网确实推动了政治参与和民主化进程,但却没有让公众参与的政治理性得到与此相适应的提升,相反,网络媒介在危害公众理性思维和行为习惯方面,展现了足以让人忧虑的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我们对于网络民主的乌托邦式的期待。总体来说,互联网时代是政治参与的时代,技术赋权的时代,但同时也是政治理性日益匮乏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在以上所述的一些方面看出网络政治理性的脆弱性,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现

象似乎从一个方面表明,以杜威为代表的,企图依靠改善技术条件而达成建设民主共同体的理想是多么的不切实际,正像詹姆斯·凯瑞所评论的那样,杜威对技术抱有“致命的简单化思维”^{[9] [P61]},这使得他的思想过于乐观而富有浪漫气息,他无法对李普曼所提出的那些致命性问题做出有效的回答,即作为政治主体的公众,其政治理性如何可能?由于在现实政治的土壤中,杜威找不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因此他将解决之道寄托给未来的技术社会,似乎不断改善民主的参与渠道和交流平台便能够解决人性在认知和心理方面存在的局限性。作为生活在二十一世纪沐浴着高科技媒体技术的后来者,我们有机会以自身的亲身体验来再次审视杜威和李普曼的争议,看出我们所处时代的问题,这是我们在时间上所占据的特殊优势,也是我们承担历史责任的开端。

参考文献

- [1] [英]詹姆斯·柯伦,娜塔莉·芬顿,德斯·弗里德曼. 互联网的误读[M]. 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 [2] [古希腊]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第1卷)[M]. 王晓朝,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3] [美]沃尔特·李普曼. 公众舆论[M]. 阎克文,江红,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4] [美]约翰·杜威. 公众及其问题[M]. 本书翻译组,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 [5] Price, V. 传播概念·Public Opinion(中英双语)[M]. 邵志择,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 [6] [美]罗伯特·威斯布鲁克. 杜威与美国民主[M]. 王红欣,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7] [美]沃尔特·李普曼. 幻影公众[M]. 林牧茵,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 [8] [美]尼尔·波斯曼. 技术垄断[M]. 何道宽,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9] [美]詹姆斯·W·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M]. 丁未,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孙洁)